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历史群像研究中的史料处理范式 与叙事建构

郑 绩

摘 要：历史群像研究长期面临核心史料匮乏、人物形象同质化、叙事维度单一等困境，研究边缘群体时，这些问题尤为突出。边角零碎史料与图像史料成为突破困境、还原人物本貌的关键支撑。《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聚焦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像，直面史料零散、记载失真、叙事刻板三大难题，搭建起搜集、辨析、整合的边角史料处理体系，并探索出图文互证、细节补白、情感赋能的图像史料运用路径。本文以该著为典型案例，梳理群像研究中边角史料的挖掘、辨析与整合方法，剖析图像史料的多元叙事功能，提炼适配无名边缘群体群像研究的史料应用范式，可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关键词：群像传记；边角史料；图像史料；叙事建构

历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之“眼”，既可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更是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点。知人方可论世，通过人物研究，我们可以窥见该段历史的结构形态；论世才能知人，只有通晓了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才能明白当事人的处境与抉择，将个体的命运与文明的走向贯通思考，期能“无隔阂肤廓之论”^①。然而历史的天空虽有夺人眼目的闪耀群星，更多的却是半隐半现、一闪即逝，甚至从未显现的宇宙尘埃。它们并非无意义的尘烟，而是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史料工作者们在实践中大都有所体会，大部分材料单独看似毫不起眼，或者没有太多意义，然而当大量同类材料被汇集在一

起，比聚而观之，它们就由无足轻重转为意味深长，可以鲜活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面貌。人物亦是如此，处于历史叙事边缘的小人物们单看毫不起眼，然而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形成人物群像后，其合集就能反映出种种隐微散佚，揭示出原本为人忽视的历史剖面。

拙作《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②以西南联合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79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郑绩：《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北京：团结出版社，2026。

大学教授太太们为历史群像,意图从家庭和女性角度探求现代中国知识生产体系背后的社会支撑体系,以及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存亡和新旧转换之际的种种思想变迁。大学和教授早已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如日中天,然而教授太太群体伴日依护,如日冕般隐身光后,寻常不得见。教授太太群体构成复杂,其内部存在代际差异,个体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单独抽论某一个,难免失之偏颇;但当她们集合为群体,则脉络共性昭然若揭。相关的史料也是如此,许多教授太太本在历史上“无名”,遑论其生平,若着眼于细部,不过细枝末节,看似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我们只有以有效线索串联,方能将海量的零碎信息置于框架之内,将边角史料有效化,整理成型,施以叙事策略,最终形成真正的研索。

一、边角零碎史料的处理范式

研究边缘人物的意义无需赘论,然而研究中所受到的多方面限制却值得讨论。人类是复杂多面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单面人,即便是名不见经传的妇孺小民,其复杂程度也未必输于寡头巨擘。然而正因其无名,其生平资料、交往关系、思想源流往往无迹可寻,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欲探幽其内心世界,论述其与时代关系等更是不得其门而入。不仅如此,研究者也受到自身所处时代与学术思维的局限,对于这些文献记述甚少之人,不只难以留心,实际更难体贴。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常规史料的匮乏。比如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们,除了极个别的出色人物,无论在何种专门史内都难觅其踪。她们既无自传,亦无人为之记传,偶有记载,或孤证不立,或演义敷衍,更多是一笔带过,千人一面。孔子曰:“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无法完成充分的论述。好在“礼失而求诸野”^②,主流记载里缺失的,往往可以在边缘史料中找到。史料归根到底是人类在文明活动中留下的痕迹,或文字,或实物,或图像,留存至今能够作为证据的都可用,只是这些史料往往以边角零碎的状态存在,收集整理另有一功。

边角零碎史料,是指未被常规文献系统收

录,而散见于私人文献、公共档案边角和民间记录中的非核心史料,其特征显现出零散性、微观性、隐匿性和非官方性,长期被传统研究视为辅助材料。经过研究实践的总结,边角零碎史料大致包括四类:一是私人文献边角料,比如日记、信件、回忆录中提及教授太太的只言片语,非专门书写,仅为叙事点缀;二是公共档案边角料,比如博物馆捐赠名单、学校校务记录、地方志人物附录、拍卖市场私人信件等,与核心事件本无直接关联;三是民间口述与零星记载,比如亲友口述、地方传闻中关于教授太太的零散信息,无文字佐证但可补白叙事;四是图像附属信息,比如老照片的拍摄背景、合影注释、人物服饰、场景细节等文字未记载的视觉信息。这类史料的核心价值在于补位,即填补正史空白,还原被遮蔽的个体细节,打破刻板叙事。在边缘群体群像传记中,边角零碎史料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由无到有的基础,有时甚至是实现从无到有还原人物的唯一路径。这些边角零碎史料经过系统性拓展与整合后,构成了《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中群像书写的核心支撑,同时其自身也完成了从辅助边缘向关键根基的身份跃迁。

边缘群体研究和史料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群体历史价值与现存史料总量严重失衡。以女性视角顾望民国知识阶层,最困难之处不外乎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并非完全依附于男性的附属群体,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战时办学与社会生活之中。这一群体是西南联大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传统历史叙事以教授精英为核心,专门记载“她们”的文献近乎空白,相关信息仅零星分布在他人日记、回忆录的夹缝之中,大量普通夫人甚至连完整姓名都未

① 按,语出自孔子《论语·八佾》。这是传世典籍中首次出现“文献”一词,孔子原意是说,自己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哪怕从书中知道了周礼如何献祭,既未能亲见隆重的祭祀,也就无法求得实证了。此后,“文献”就被引申为历史证据。[春秋]孔子著,裔一译注:《论语》,第4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引用孔子语,“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能留存。历史学家皮名举乃巨儒世家子,按当时门当户对的结亲原则,皮太太应该不至于全无来历,但就是连名字都找不出来。皮名举的儿子皮崇平写过回忆文章,提到父亲爱书的种种逸事,谈及母亲只道贤淑,具体的细节一概没有。各大小拍卖处有一些皮崇平的信件,可惜甄别后全无所获,皮太太的名字只好留白。再如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工学院教授刘仙洲先生,他夫人所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田慰秋”,一生事略不过六字“长期操持家务”。还有吴有训等人的好友孟昭英先生,他本人成就载入史册,夫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20世纪80年代末,有过对孟先生的专访,孟夫人也有参与,被访人只写“孟昭英夫人”。

除了一些零碎单篇或采访时的只言片语,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们留下系统文字可供回忆的也屈指可数。另外,由于关涉女性群体,其情感婚恋状况很容易在传播中变形,要区别八卦与史料,就需要反复考证其说法来源,辨析其准确性。

第二,人物形象多元性与史料叙事刻板化形成冲突。西南联大教授太太的出身、教育背景、人生选择差异极大,并且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她们中既有恪守传统、操持家务的旧式女性,也有接受新式教育、追求自我价值的知识女性,有人安居家庭,有人深耕学术,有人投身社会活动。观察她们的自我选择与活动轨迹,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现代中国在各个层面的演进、变迁,也能映射出大学教授这一社会阶层的文化特殊性与历史代表性。如第一点所言,有关她们的专门记录不多,即便有,也多是出于家属和学生撰写的回忆性文字,大多陷入“贤妻良母”的模板化叙事,往往以一句“温良贤淑”一笔带过,刻意美化、简化人物,掩盖了个体的性格差异、人生困境与独立思想,最终导致群像趋于同质化,极大地削弱了相关研究的意义。

不仅如此,即便是教授太太自己的回忆录,有些也是男性视角的复制。比如,《我与冯至》^①的执笔者确是冯至夫人姚可崑,然而冯至作为主导文本视角的隐性主体始终在场。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写作,作为实际上的话语人,除了本人现场参与意见之外,冯至的日记、书信、创作

等资料更是大量存在于写作现场。姚可崑本人的叙事和抒情都是被冯至视角限定的,并且被反复修正过,这本回忆录因此失去了考察往事的独立姿态,可以算作是对冯至研究的补充,难以形成双人视角的对照互证。

第三,史料碎片化与群像叙事整体性相互矛盾。群像传记需要梳理人物关系、搭建完整叙事脉络,而该群体的史料极度零散,难以串联成完整的人物脉络,给群像的整体建构带来巨大阻碍。群像传记区别于单人传记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叙事并非聚焦单一人物的人生轨迹,而是要在纷繁的人物网络中梳理人际脉络,搭建统一完整的叙事框架,最终呈现群体整体的生存面貌与精神特质。相关信息如同散落的碎片,零星夹杂在友人日记、师生回忆录、文集附录、老旧影像的边角注释之中,不仅人物与人物之间缺乏史料关联,单一个体的生平线索也时常断裂。这种碎片化的史料状态,使得研究者与创作者难以将孤立的信息串联成连贯的人物生平,更无法依托零散素材梳理群体内部的交往、互助、姻亲等多重关系,最终给群像叙事的整体建构造成了极大阻碍。如果无法完成碎片的拼接与串联,群像书写便会沦为孤立人物简介的简单堆砌,失去群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面对这些问题,需摒弃传统史料搜集思路,不再局限于正规校史、名家文集等常规文献,而是要主动拓展搜集渠道,从博物馆档案、民间藏品、老旧影像等乏人关注的领域寻找线索。同时针对回忆录刻板、网络信息失真的问题,坚持批判性考证,拒绝被固有叙事裹挟。其本质是一场基于零碎史料的历史批判性重构,依靠碎片化线索,逐一考证人物身份、梳理人际关系、还原生活场景,最终将散落的历史碎片拼接为完整的历史群像,同时发掘出这一群体的时代意义。

要解决史料难找的问题,搜集工作需要跳出传统视野,突破常规渠道,采用多元化挖掘策略寻找隐匿性的边角史料。以下三个延伸方向

① 姚可崑著有《我与冯至》,回顾了她与冯至自1928年到1965年之间的共同生活。此书有两个版本,初版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是“名人之倡回忆丛书”第二批中的一种。

或可考虑。

第一,从核心文献向边缘私人文献延伸,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官方史料与名家专著,重点翻阅各类文集附录、日记、私人回忆录、亲友往来信件。这类文献的写作主体并非传主,却留存了不经意的记录,是挖掘无名人物的重要入口。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已经排印出版,并有修订,前后两版注释颇详,然而其中有一位Z·S女士,在日记中出现了将近70次,却未注明是何许人也。2022年西泠秋拍有梅贻琦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间日记手稿一册。经对比,整理者删去了1946年2月4日所记,内容正是梅贻琦给Z·S的复信,其情颇可玩味,也由此可知,Z·S即朱经农续弦杨静山。再对比《吴宓日记》《胡适全集》和另外一些人的回忆录,串联起来,不但可知给胡适写匿名情书的“Zing San”即杨静山,还了解到当时除了“太太的客厅”,还有杨静山的法语沙龙。

第二,从学术文献向公共档案延伸,充分利用公共机构的冷门档案,包括博物馆捐赠名单、地方志、旧行政文书等,特别是在寻找确切人名时,档案尤其有用。唐兰先生身后出版有厚厚的12本文集,然而翻遍资料,只在《唐兰全集·论文集》中找到一张照片,下面写着“与夫人张晶筠合影”,由此总算是知道了唐夫人的名字。孤证怕有错讹,绞尽脑汁忽然想到唐兰家属曾向国家博物馆有所捐赠,查询国博捐赠名单,果然相符,这才算数。可是张晶筠生平事迹几乎付诸阙如,若不是何孔境的回忆录里曾提到过一笔,张晶筠将完全无法出现在《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里。再比如周先庚夫人郑芳是吴江盛泽人,郑家在当地乃是大族,查阅方志可知柳亚子是郑芳的姑父,郑家与南社关系非凡,这对理解郑芳日后成为专栏作家有很大助益。

第三,从纯文字史料向图像附属信息延伸,将老照片、历史影像的注释、场景、人物排布等纳入搜集范围。图片的作用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其中很多图片补足了文字资料的不足,另有一些有趣的小发现,比如在照片中看到了徒步团到达昆明时各方献花的实景,发现杨步伟的二女儿与女婿,正是当时献花的少女与接花的青年学生,那应该是他们的初次相遇。后来,已

入美籍的二女儿追随丈夫回到中国,与父母相隔重洋,生死茫茫,成了杨步伟夫妇最大的牵记。人生际遇往往千里伏线,热爱并擅长组织活动的杨步伟,在冥冥中已将女儿的命运排定。老照片里的人生故事,非文字所能传达。

边角史料存在一些天然缺陷,比如回忆录存在主观美化和模板化叙事,不少零碎信息容易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导致曲解史实,以及单一零散记录易形成孤证。针对这些问题,或可建立三重辨析机制,严格把控史料真实性。

第一,多重印证原则。坚持“孤证不立”,对同一人物、事件采用多来源史料交叉验证。以对张晶筠的考证为例,须同时参考合影注释、国博捐赠名单、他人回忆录三份独立材料,三份信息相互吻合后,才正式采信该人物信息。对于重大事迹、人际关系等内容,均需要两份及以上独立史料佐证,从根源上规避误判。

第二,细节辨析机制。以精细化视角拆解文本,打破教授太太“温良贤淑”的模板化叙事。家属、学生的回忆文字习惯用统一话术形容教授太太,必须跳出固有印象,深挖文字背后的细节与矛盾。从细节入手考究,会发现人像辨识错误几成常态,对人物关系的八卦式解读更是罔顾历史语境,甚至有说唐兰是陈寅恪夫人唐筼之兄,类似想当然者随处可见。此外,很多资料来自家属、学生的回忆录,在为尊者讳的传统以及对女性描写的刻板印象之下,无论是人物的复杂性还是鲜活感都会损耗不少。人生不尽是美好,除了国破家忧之外,她们也面对着情感上的难堪、家庭中的矛盾、职业上的两难等种种困境。真正的历史更加惊心动魄,只是材料来源芜杂,辨别不易,且多有互相冲突矛盾之处。研究只能以细节撕开刻板标签,还原真实的历史处境与情绪,让人物摆脱扁平化。

第三,消极史料活用。“积极史料”和“消极史料”这一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他说:“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①我们可将史料缺失视

①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作一类特殊消极史料,解读背后的历史逻辑,通过解读史料缺失的现象,折射出整个群体的生存常态,让史料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延伸。

历史不仅存在于有记录的内容之中,也潜藏在无记录的空白地带。所谓消极史料,核心是依托现象缺席、记载缺失、事物未发生等客观状态,反推时代环境、社会规则与群体命运,其解读难度更高,却往往能触及积极史料无法覆盖的历史深层逻辑。

这种大范围、群体性的记载缺失,绝非文献散佚造成的偶然结果,而是民国社会性别结构与时代观念作用下的必然现象。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历史边缘人物便彻底隐匿于宏大历史叙事之中,成为被遗忘的群体。这种空白本身也是历史信息,将“无记录”视作消极史料,作为切入点,便可由个别案例推演群体特征。从个例延伸到整个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的生存现状,由此清晰勾勒出民国时期传统知识女性的生存边界,她们是时代变局的亲历者,却因社会规训与身份束缚,失去了被历史记录的可能。

活用消极史料的辨析方法,打破了传统史料观的局限,不再将记载缺失视为研究障碍,反而把历史空白转化为解读时代、群体的重要依据。这一思路不仅补足了积极史料的短板,完善了对边缘群体的整体认知,也让历史群像研究跳出了单一人物考证的层面,上升到对时代生态、社会结构的深度反思,进一步延伸了史料的使用价值与研究的思想深度。

二、图像史料的叙事升级

在传统研究中,图像长期被当作文字的附属配图,仅起到辅助作用。《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尝试彻底重塑图像史料的定位,将其视为独立的考据载体与叙事媒介,实现其从配图到独立史料的地位跃升,挖掘出考据、叙事、补白三大核心价值,实现图文互证的叙事升级。

首先,图像史料具备考据价值,主要体现在用视觉信息还原人物身份与史实。图像具备直观、真实、不易篡改的特性,是重要的考据工具。画面中的人物、服饰、场景、文字注释,均可与文字史料交叉互证,解决孤证难题。

图像可辅助考证人物身份。图像史料具备不可替代的人物身份考据功能,大量无名、半无名的西南联大女性仅依靠影像载体留存身份线索,再搭配图像附属文字、官方馆藏纸质档案等形成多重互证,解决边角史料孤证难立的核心难题。比如黄珏生夫人梅美德,她过世甚早,当下的知名度不高,但实际上在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校史上,她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梅美德在昆明过世,其葬礼规模之大,吊唁人数之多,为西南联大之最,沈从文也送了挽联。不仅如此,她的身世也极富历史意义,她出生于芝加哥唐人街,其家族曾为芝加哥唐人街之王,之后她携庶母弟妹回到中国,再去芝加哥大学读书,与丈夫黄珏生在那里相识相恋,最后随夫回到中国。其间涉及美国华人境遇、中美关系、宗教活动、南开校史、西南联大校史等种种问题,然而她的早期生活几乎没有记载,只在他人回忆中提到只言片语,好在有一张伍廷芳与梅美德姐妹的照片,上面的签名证明了人物的确切姓名,并且明确显示出梅家在芝加哥的地位。梅美德与黄珏生的结婚照则证实了他们在芝加哥就已经结婚,这补充了她生平轨迹的关键节点并使之更为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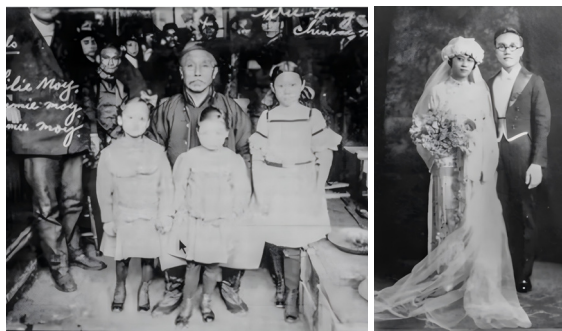


图1 左边照片为晚清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芝加哥与梅氏姐妹合影,右一为梅美德(1899—1939);右边照片为梅美德与黄钰生(1898—1990)结婚照,摄于芝加哥

与此同时,图像自带的视觉细节能够提供文字不会记载的阶层、家境与生存佐证,日常生存状态仅凭画面装束、居所布景便能清晰区分,为群像分层叙事提供客观视觉依据。对比黄珏生和梅美德的结婚照与昆明生活照,分明呈现了从芝加哥到昆明的地理、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变迁。



图2 梅美德与黄钰生在昆明

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本是官宦之后,自小在俄国留学,家中说俄语,吃俄餐,用俄国保姆,到了昆明后生活习惯完全改变,后期生活困难,和梅贻琦校长夫人韩咏华一起做定胜糕售卖,袁家的老妈子负责制作糕点。相关语言表述似乎平淡,然而前后照片的对比却能够将战时的艰难直观呈现。1929—1937—1942年,袁家的孩子们数量增加,年龄渐长,衣着日渐简陋,少爷小姐味逐渐淡化,家庭文化在战时的变化,一目了然。



图3 1929年,廖家珊、长子和俄籍保姆于哈尔滨



图4 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前夕廖家珊和孩子们于北京南横街家中,后来逃难时路过香港地区和越南,用此照片办集体护照



图5 1942年夏,袁家孩子们于昆明黄土坡

“做糕三人组”的另一个成员是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她负责原料采买。潘光旦虽一条腿残疾,却是个十分乐观豁达的人,他的太太赵瑞云也很能想办法为家人改善生活。从照片里看到潘光旦一家在昆明虽身居乡野而不改其乐的样子,由此会对当时上了《大公报》的“潘光旦吃老鼠”事件产生新的认识。来到昆明,对当地人的饮食产生莫大的兴趣,敢于亲身尝试,这不正是生机勃勃、热情洋溢的潘家人会做的事吗?



图6 左边照片为潘光旦、赵瑞云夫妇与五个女儿;右边照片为潘光旦手捧大葫芦,和家人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其次,图像史料具有叙事价值,通过图文互证建构立体叙事,用图像印证文字、延伸文字,从而达成并引领叙事。图像能够捕捉文字叙事刻意遗漏、无意忽略的历史微观瞬间,挖掘文字记载完全缺失的人际线索与命运伏笔,实现历史场景的补全与复现。书中记载的湘黔滇旅行团昆明入城欢迎仪式纪实老照片是图像证史的标杆案例,现存联大校史、师生日记、个人回忆录全部只记录“各界人士入城欢迎徒步师生”这一宏观事件,无任何文字提及欢迎现场青年男女的交集细节,而此次欢迎仪式全景照片完整定格画面分层信息,前排献花少女为杨步伟次

女赵新那,列队接受鲜花的青年学生正是黄培云,二人初见的完整场景被影像永久留存。这条由照片独家解锁的人生线索,串联起二人此后赴美成婚、晚年归国相守的完整人生脉络,成为解读两代知识分子家国际遇的关键隐性史料。



图7 旅行团入昆明时献花的人,左一为赵新那

除此之外,图像史料还可贡献叙事的情感价值。历史不但需要求真,也需要人文温度。图像擅长捕捉细节,令研究者与历史形成情感共鸣。梅美德带队护送女眷迁徙途中留影,补充了文字简略提及梅美德照护女学生的具体行动细节。而韩咏华挎篮运送定胜糕的实景照片,弥补了文字无法具象呈现她放下校长夫人身份谋生的真实状态。另外,陶曾毅与北大教授家属无同框合影,直观展现其长期游离于太太社交圈之外的孤立处境。诸多案例证明,文字叙事受书写视角、篇幅局限存在天然留白,而老照片中定格的动作、站位、人物互动、现场环境,能够捕捉被文字过滤掉的鲜活史实,以直观视觉细节填补文献空白,在多重图文对照之下大幅提升群像叙事的严谨度与史实可信度。

下图为蒋梦麟、陶曾毅的结婚照,证婚人胡适等人在侧,正可见证这场著名的婚礼。



图8 蒋梦麟(1886—1964)、陶曾毅(?—1958)在北平结婚,证婚人胡适

再次,图像史料具有补白作用,可以填补文字叙述的微观空白。传统文字史料受书写逻辑与篇幅限制,天然偏向记录战争迁徙、办学调度、学术论争等宏观事件,或对人物做出“贤良”“坚韧”这类抽象定性评价,对于日常衣食起居、人际细碎互动、隐秘内心情绪等微观生活维度往往一笔带过、简略虚化。《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收录大量未公开发表的私人老照片、实地影像、民国生活纪实图像,依托书中多组图像例证,从日常生存、隐秘情感、群体多元气质三大维度补足文字叙事的缺失部分,以具象视觉细节填充西南联大女性历史的缝隙,让原本扁平的文字记载变得饱满可感。



图9 为参加昆明市第一届运动大会,西南联大教授马约翰(1882—1966)的夫人戴连连夜制作了这面西南联合大学校旗。1996年,居住在美国的西南联大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1943届毕业生沈元寿将其带回中国,捐给母校(现存北京大学校史馆)

图像补全文字失载的战时生活化微观细节,具象还原物资匮乏下的生存实景。文字仅能笼统记述“联大八年物价飞涨,各家度日艰难,太太们各谋生路”等,缺乏可感知的生活具象,书中多幅专属影像填补了这一空白。



图10 1939年建成的西南联大铁皮屋顶教室



图 11 西南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图源北京大学校史馆）

和后世的想象不同，战争后期，这些教授家庭虽贫，卖书换食，却仍保有着知识分子独有的尊严，尤其擅长苦中作乐。为防空袭，周培源将家安置于离学校步行需要大半天的乡下，买不起自行车，遂骑马往来，号为“周大将军”。虽处荒郊野岭，住在农家木屋，这些庚款留学生依旧西装革履、长衫礼帽。陈岱孙这位昔日的“波士顿少年”从清华出奔时，仅手提一只装满学校文件的小行李箱，未带一样私人行李，身着一件白长衫从北至南，到了昆明，锃亮的皮衣又上了身。梁思成夫妇和朋友们在自己新建的小砖房前合影，意态从容，中国那一代读书人的风骨透相而出。这些生活类图像捕捉到文字无力细致描摹的生存细节，将抽象的安贫守道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真实日常，视觉冲击力远胜于书面概括。



图 12 左边照片为骑马的“周大将军”，右边照片为 20 世纪 40 年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培源



图 13 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澂、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继桐扶周如枚



图 14 林徽因（1904—1955）、梁再冰、梁从诫、周培源、陈意、梁思成（1901—1972）、陈岱孙、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金岳霖

图像可以捕捉文字难以直接书写的隐秘情感与内心状态，依靠神态、肢体动作完成情绪补白。回忆录、访谈文字碍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很少直白书写女性的委屈、焦虑、柔软等复杂心绪，但合影、居家抓拍的神态动作会自然流露真实心境。文字只能间接转述人物心境，而图像定格的一颦一笑、肢体姿态，把藏在文字背后复杂、细腻的情绪完整释放。

赵瑞云又怀孕了，前面已有四个女儿，她盼着这第五回来个儿子，潘光旦却说都好都好，夫妇俩在相片中永远笑得那么灿烂。



图 15 潘光旦（1899—1967）与赵瑞云（1898—1958）

看杨步伟那惬意的坐姿，赵元任下意识主动向妻子倾斜的体态，便可知这对夫妇的相处方式。



图 16 杨步伟与赵元任银婚纪念

多组分圈层夫人合影互证,补全被“贤妻”单一标签遮蔽的群体多元风貌,打破同质化刻板叙事。现有文献文字习惯将所有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笼统概括为“牺牲奉献的家属”,但书中按不同圈层收录多幅合影,分层呈现截然不同的女性气质。其一为传统旧式夫人群像:王淑贞、田慰秋等人的影像,衣着素净传统斜襟布衫,举止温和内敛,平日重心全在抚育子女、打理家事,恪守旧式家庭本分,是传统持家女性的典型缩影。其二为留学新式太太合影:梅美德、杨步伟、俞大綵等独具风采,身着西式衣裙,身姿舒展,合影姿态大方外放,擅长社交组织、独立开展公益与文化活动,兼具现代学识与行动能力。其三为学术同行型夫人合照:崔之兰、蒋守方等女学者着装简约干练,气质沉静理性,她们自身拥有专业学术能力,因校规只能另寻教职,兼顾学术研究与家庭。三类图像并置对照,清晰区分传统主妇、社会活动女性、职业知识女性三类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推翻文字塑造的千人一面的“太太模板”,完整还原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丰富多元的整体风貌。



图 17 1935 年 2 月 23 日,《北洋画报》第 1209 期,《三百对庆祝四十年》,配图为“明日举行四十年结婚纪念之南大校长张伯苓夫妇”



图 18 陶曾毅



图 19 崔之兰(1902—1971)与张景钺(1895—1975)



图 20 俞大维与陈新午

三、历史群像研究的叙事建构

依托边角零碎史料与图像史料完成搜集、考证、辨析之后,群像研究进入最终叙事建构环节,至此,史料才能实现真正的应用闭环。如上文所述,边缘历史群体天然存在史料碎片化、人物同质化、定论刻板化等问题,史料的特性决定了这些群像叙事无法沿用传统精英的线性叙事范式。《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尝试在史料整合基础上,建立一套适配无名边缘群体的群像叙事逻辑,即建立研究主脉络,既以标签体系完成人物归类整合,同时又主动消解标签带来的遮蔽性;并行古今双向双重批判视角,既清算旧史料的性别化刻板书写,又警惕现代价值尺度对民国历史人物的强行规训;结合整体与局部观察,以人际网络为骨架、时代思潮为内核,串联海量零散个体,在保留微观情感与私人细节的前提下,实现碎片化史料向完整历史群像的有机统一。

任何群像研究都面临着个体零散与群体统一的内在矛盾。上百位乃至更多出身、教育、性格、人生道路完全不同的历史人物,若完全抛弃分类概括,仅逐一铺陈单人琐事,研究将沦为无逻辑人物小传的堆砌,丧失群体研究的宏观视野。尤其是大量历史边缘人物,大多仅有一两处边角记录,若无统一分类标签作为锚点,研究者无法对海量分散史料进行有序分拣、归类,群像研究将彻底失去结构。比较好的方式是设置多层分级标签,形成由粗到细的研究框架,实现零散史料有序收纳;但若直接套用传统现成标签,又会简化人物复杂生命,遮蔽其独立历史价值。标签作为研究切入的工具,具备不可替代的整合功能,但其自带的简化、固化属性又会形成思维枷锁,必须充分利用策略,对其利弊进行审慎权衡。

首先要确定宏观身份标签,划定研究边界,《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将所有书写对象从民国女性、知识分子家属两大宽泛范畴中剥离,确立专属研究群体。若无“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这一核心标签,梅美德、俞大綵、赵萝蕤等人的零散事迹将分属南开校史、清华文人群、现代文学研究等不同领域,无法汇聚为统一研究对象。

其次为中层类型标签,这是全书分章叙事的核心框架。《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依据教育背景、职业选择、社会活动、家庭身份划分四类核心标签,分别为旧式婚姻、新式女性、学术同行、家庭情感处理者。每一类标签对应独立章节,批量收纳同类型人物的边角史料,归入同一叙事板块,有身份交叉者则取其较有历史意义的身份。同类微观史料相互补充,共同呈现不同类型女性在战时家庭支撑层面的共性行动。图像史料同步配套标签分类,完成群体归类,让分散碎片形成集群研究。

第三层则为微观特征标签,用于单章内部线索梳理。如此,在统一标签下对人物进行的差异化研究,更好地体现不同人物在成长背景和历史情境下的自我选择,既完成人物聚合,又保留个体区分,避免归类带来的完全同质化。

然而标签自带遮蔽性,固化思维会消解人物的多元命运,看似概括了人物身份,实则形成视角遮蔽,它们压缩、简化、扭曲了人物完整的

生命层次。事实上,史料辨析阶段便已充分暴露传统标签的弊病。在西南联大教授太太这一重标准下,这些遮蔽尤其明显。

“太太”这一标签以家庭身份吞噬个体独立价值。主流回忆录、校史文献提及联大夫人时,几乎统一套用贤妻良母标签,将所有的人生意义限定于辅佐丈夫和抚育子女的单一维度,可以说是刻意抹去女性独立能力、精神追求与社会行动。“教授太太”这一标签形成单向价值评判标准,女性所有行动须依附男性丈夫才有记载,独立事业、思想追求全部沦为边角,可有可无。

标签的另一重遮蔽是用统一模板消解个体差异,制造千人一面。“贤妻良母”作为通用标签,形成标准化叙事模板,无论人物性格、处境、选择差异多大,记载话术高度趋同。史料被标签模板压缩为同质化短句,人物的喜怒哀乐、困境抉择全部被删改。深入研究,颇可见当时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表态,但传统标签叙事将之全部简化为勤俭持家,背后的历史演进、性格差异、人际逻辑、生存选择彻底消失,群像沦为无区分模板集合。

同时,二元对立标签制造价值偏见。基于标签的现有史料多衍生出对立标签,安分持家者为贤内助,积极参与社交、拥有独立思想者则被贴上不安分、多事标签。标签先行形成价值预判,史料筛选、叙事描述均带有先天偏见,无法客观呈现完整人物矛盾性。针对标签整合优势与遮蔽弊端的内在矛盾,《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尝试采用平衡策略,既依靠标签搭建叙事框架,又持续拆解、重构标签,打破符号固化束缚。

首先要区分功能性叙事标签与价值评判标签,废弃带有道德预判的传统标签,仅使用客观中性分类标签。努力摒弃贤妻良母、内助等带有价值褒贬的传统表述,采用基于客观事实的中性分类,以旧式持家女性替代道德化贤妻,以独立学术从业者替代教授夫人,标签只陈述客观身份、人生选择,不附加好坏评判。书写陶曾毅时,不再使用偏见标签,而是仔细辨析各种评价性史料,不再看他人如何说,而是看她如何做,以客观身份为叙事起点,再完整铺陈她的婚姻

经历、人际矛盾、善意举动,摆脱标签所预设的负面形象,尽量充分地呈现出当时的史实。

其次要拆解标签所预设的同质化模板,用细节强调个体差异,深究其中的意义所在。同样是包办婚姻的旧式家庭主妇,张伯苓的夫人王淑真隐忍持守,最钟爱的小儿子在抗战初期便已殉国,八年中她一句不问,抗战胜利后要回乡团聚,长子才告诉她,听到确切消息,她将自己关于屋内整整一个下午,出来后终生再未提及此事;杨武之的夫人、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性格刚强,因不识字传达有误而耽误丈夫工作会议,事后将自己的胳膊啃得伤痕累累,以作自我警醒;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因文化程度不高、家庭出身不显等原因,不敢和其他教授家庭有太多的交往。她们属于不同的代际,而现代中国在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上转换迅速,每一个代际都有不同的特点;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出身,受到不同的规训,这些又决定了她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她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个体追求,哪怕在战争年代,处于同一个教授太太圈,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选择仍然有着差异。正是这些历史的细节,共同构成了历史现场感,也使得人物研究具备了价值。

再次还要用动态分层重构标签,随研究推进打破初始分类边界。人物标签并非固定不变,需要随人物关系的变化及人生经历的推进主动跨类研究。书稿将杨步伟归入社会活动型太太标签内,同步铺陈其持家育儿、照料赵元任日常的细节,兼顾其新式活动者与家庭主妇双重身份;将赵萝蕤既归为自身具有文学成就的女性,又书写其种菜养猪、打理家务日常,打通学术女性与传统主妇的标签壁垒,证明单一标签无法概括完整生命。研究不应将人物禁锢在单一标签内,而是要以跨类研究消解符号固化带来的遮蔽效应,实现工具标签的有限使用、动态拆解。

在史料运用上,我们还需要同时保持双重警惕,既清算传统刻板书写,又警惕现代价值越界。群像研究的真实历史感建立在双重批判视角之上,第一层批判面向原始史料和既往研究,清算民国以来对历史人物的刻板、简化、遮蔽式研究;第二层批判面向研究者自身,警惕以当代

观念和现代道德标准回溯历史,用今人的尺度强行评判历史人物的生存抉择,陷入以今度古的时代错位误区,力求形成克制、客观、兼具人文反思的研究立场。

以西南联大教授太太为例,在民国日记、回忆录、校史文本中,女性永远作为男性附属出场,叙事主语始终是教授,太太仅作为补充插曲,不存在独立叙事线索,史料的传统视角选择性屏蔽了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维度。传统叙事预设男性为历史主体,女性不具备独立叙事资格,仅作为家庭背景板存在。很明显,如果遵循此种叙事逻辑,那这一群像的研究意义将无所依存。只有将每一位太太设置为独立研究主体,依托对无名女性的考证过程,以她们的人生时间线为主线,以丈夫事迹为背景补充,才可证明,即便无丈夫相关记载,女性自身的流亡、谋生、抚育行为也具备独立历史意义,不必依附男性才能进入历史叙事。因此,书中采用大量脱离丈夫的影像,以单独形成叙事单元,从视觉层面打破夫人必须依附丈夫出镜的传统书写习惯。

此外,面对在价值判断上较为单一的零散史料,还需批判模板化的道德简化,以还原历史人物复杂矛盾的处境,从而研究其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中国为尊者讳的史书传统往往刻意扁平化历史人物,抹去其间的委屈、挣扎、人际矛盾与情感困境。尤其是西南联大教授太太们,自己留下的情绪性文字非常少,属于她们个体的矛盾、难堪等负面私人情绪在正统校史、纪念文章中被回避,只保留完美道德符号,掩盖了真实的人物走向。凤子与孙毓棠离婚,袁永熹远走美国,吴筱元晚年与华罗庚分居,当揭去史料表面的平面道德膜,不回避此类史料的复杂性,史料才能被物尽其用,找到研究切入的缝隙。

如果说对传统刻板叙事的批判是向外清算史料偏见,那么对自身叙事立场的自省则是向内约束创作尺度。在研究民国人物,尤其是女性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性别观念和道德体系的差异。当代性别平等观念普及,尤其受左翼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很容易不自觉以当下的婚恋、职业、性别标准评判民国女性的人生选择,以现代自由独立的标尺苛责身处新旧夹缝,受时代制度、经济、礼教多

重束缚的女性,陷入时代错位的研究误区。在此自省式批判是必要的,需主动划定古今评判边界,从婚姻、职业、家庭等几重维度克制现代视角越界。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双重批判不能割裂开展,必须建立统一的研究准则,即所有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包括边角史料和图像史料等史料基础上,以完整还原史实为第一步,先复原时代客观环境,再开展双向反思,杜绝先入为主的偏见评判。以《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为例,书写任何一位教授太太前,力求完整整合其所处的经济、礼教、战争、校园规则等客观条件,将图像、信件、口述等多元史料前置,只客观陈述史实,不插入价值评判。史实完整呈现后,先向外批判传统史料遮蔽、刻板书写问题,继而向内自省,标注现代视角容易产生的错位评判误区,主动说明古今标准差异,形成克制、辩证的研究基调,以实现历史真实与价值反思的平衡统一。

群像研究的核心难题,是海量孤立、断裂的人物史料碎片如何形成有机整体。统好了标签,树立起了双向批判,才可以将史料碎片统合为整体研究。然而仅依靠标签分类只能完成表层归类,无法打通人物内在关联,文本依旧是割裂的人物集合。《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尝试采用三层整合逻辑:以姻亲、同学、邻里人际网络搭建人物横向骨架,以知识分子的家国精神作为纵向叙事内核,以私人生活、情绪、生存微观情感填充叙事血肉。三层维度相互交织,将数千份零散边角史料、数百张图像史料串联成完整有机的西南联大女性群像,希望能够既保有每个人物独有的细节与情感,又提炼群体共有的精神底色,实现碎片化史料向整体性历史图景的转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并非随机松散的集合,而是依托世家联姻、新式学堂同窗、战时同居邻里形成盘根错节的社交网络。大量边角史料、合影图像中散落的人际线索,将这些线索梳理整合,原本孤立的无名女性个体彼此联结,碎片化人物小传才能转化为互通的群体历史。民国知识阶层多通过联姻形成跨校、跨地域人脉,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姻亲关系遍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串联人

物最核心的线索。书中典型案例为韩、潘、袁三家互助脉络:韩咏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为表亲,潘光旦夫人赵瑞云的弟弟赵世昌在清华庶务任职,三人依托亲属关系合伙制作定胜糕谋生。相关史料原本各自独立,有韩咏华卖糕相关口述整理,同事和邻居对潘光旦一家回忆片段,廖家珊女儿对制糕的书面回忆,分属三份不同文献;梳理姻亲关系后,三份碎片合为完整互助事件,三位独立人物形成叙事整体,相关性得以体现。另一核心姻亲网络为俞氏、陈氏、傅氏,俞大綵嫁傅斯年,陈寅恪之妹陈新午婚配俞大维,俞大綱、曾昭抡为表亲,整个姻亲链条串联俞家姐妹、陈寅恪夫人唐筼、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等多位女性。原本分散在不同文集、回忆录中的人物记载,依靠姻亲关系彼此勾连,形成横跨文史学科的女性社交圈层;再加上配套图像,如俞家族人集体合影、陈寅恪与唐筼居家照、傅斯年夫妇北平留影,以影像印证姻亲人脉,让文字碎片可视化。

同时,清末民初女子师范、教会女校、海外女留学生群体形成长期同窗情谊,乃至互相介绍男友,抵达昆明后持续往来,构成又一层人际脉络。南迁昆明后校舍紧张,大量教授家庭集中居住在岗头村、黄土坡、西仓坡等地,比邻而居形成临时邻里网络,也是零散生活史料的重要串联线索。周培源夫人王蒂澂、任之恭夫人陶葆桢、邵循正夫人郑逊等同住城郊,常结伴种菜、缝补、躲避空袭;梅家、潘家、袁家比邻而居,日常共享食材,相互照料子女。各家零散生活记录、居家抓拍影像,依靠邻里关系整合,共同呈现战时家庭互助的生存图景。这些人际网络互相交织,解决了人物孤立和研究断裂的问题,让群像不再是单人小传的简单堆砌,而是互通互联的有机社会群体。

人际网络促成人物横向联结,而统一的精神内核提供纵向研究主线,将不同出身、性格、职业的教授太太统一置于同一时代价值框架下,提炼群体共性。抗战乱世,文脉存续、民族自救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这份追求延伸至家属群体,她们有着家国存续的担当精神。这群女性身处传统礼教与现代文明交界,既接纳旧式家庭责任,又主动吸纳新式思想,形成兼容

并蓄的坚韧特质。无论传统还是新式女性,均能在双重文明夹缝中找到生存平衡,隐忍而不失主见,温和而保有风骨。新旧兼容的生存韧性,成为串联全部人物的内在精神线索。她们没有单纯依附男性,也未完全割裂家庭,在公共互助与私人家庭之间找到平衡,有条件者参与社团、办学、学术,无条件者以家庭劳动支撑公共学术圈层,公私领域双向付出,构成独有的公私平衡人文底色。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依靠人际网络、精神内核完成整体整合之后,又要避免研究弊病,不能过度追求群体共性,抹杀每个人独有的私人细节、内心情感,以免再次陷入千人一面的刻板研究,须以微观私人史料、图像情绪细节填充叙事血肉,平衡整体性与个体独特性。

零碎史料中有大量私人生存细节,如衣食、劳作、居所、育儿等日常独有的生活痕迹,每一段细节仅属于单个人物,作为区分个体的独特标识留存人物专属记忆,避免被群体共性覆盖。此外,内在情感细节则需要回到历史现场,进行研究上的体贴。这类细腻私人情绪仅存于私人信件、日记边角与人物合影神态之中,是区分人

物性格的核心素材。

群像叙事建构是边角史料、图像史料考据工作的最终落点。标签叙事、双重批判、碎片整体性整合三重路径,共同构成适配边缘无名女性群体的完整叙事体系。工具化中性标签解决史料零散无序问题,但必须持续拆解标签遮蔽性;内外双向双重批判平衡传统史料偏见与现代史观错位;人际网络与时代精神搭建整体叙事框架,微观私人细节守护个体独特性。三者协同,既依托海量碎片还原真实历史群体,又规避群像写作极易出现的同质化、片面化、时代错位弊病,或为同类近现代边缘历史研究提供可复制的史料研究范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研究”(25SGC1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绩,浙江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科学及区域文化研究,著有《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等。